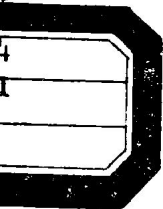


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

奚 其 文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

奚其文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

窦其文 著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5.5 印张 字数 12 万

1986 年 6 月 第一版 1986 年 6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800

统一书号: 7363·019 定价: 1.05 元

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十周年

前 言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宣传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命名，已经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的新闻思想，是构成毛泽东思想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总结其丰富的报刊实践，探讨其精深的办报思想，从而对我国无产阶级党报历史的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述和论证，以正确指导今天的新闻工作，这正是当前党的理论战线的重大任务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对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和评价工作，开始受到理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的普遍重视，并有一批资料丰富、分析透辟的文章问世。这是很令人鼓舞的。但是，其中大多数论文都是对其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而关于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的研究却十分不够。

本书的写作，即试图对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的形成、在实践中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无产阶级党报学说的具体贡献作些初步探讨。显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作者本人水平的限制，加之资料缺乏，完成这样的任务实在是困难的。我衷心期待着广大读者和专家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正。

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生中，曾经付出很多精力参加或指导新闻工作。事实上，他青年时代从事革命活动之初，就看到了报刊的重大社会作用，并对新闻工作寄予极大的关注。这与马克思的经历十分相似。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当时进步报刊的召唤，使他走出书斋，投入到火热的社会政治斗争之中。报刊工作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使毛泽东在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生活中，始终把出版报纸作为指导革命的重要手段。他看到“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页）因而十分重视运用报纸这个工具唤醒群众，教育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

毛泽东同志的新闻思想，伴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并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顺利进行都发生巨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的新闻思想，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它是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大变革的产物，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光辉实践的理论概括，鲜明地体现着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任务紧密联系的特点。因此，只有结合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进行考察和研究，才能对毛泽东同志新

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基本特征获得深刻认识和全面理解。毛泽东同志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新闻思想也反映了这个过程。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新闻思想，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采取科学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不切实际地苛求他，也不能主观臆断，溢美过甚，而是要把他看作实践中的战士，既要认真总结他对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说的伟大贡献，也要正视其中的不足之处。

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中，专门论及新闻工作的文字并不很多。对散见于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和指示中的新闻观点，要进行集中、概括；还要结合他的全部理论加以研究，才能正确领会其要义。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曾亲自为报刊、电台、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新闻稿件和政论文章，这些都是其新闻思想的具体、生动的体现。这些文字与他的新闻观点彼此辉映，相辅相成，构成毛泽东同志光辉的新闻思想，当然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不跨越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从来认为新生的事物是从旧事物中发展起来的。在对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的研究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办报实践中，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思想；对列宁的办报原则也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结合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实际，创造性地具体运用，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无产阶级党报学说，为发展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研究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中阐明的坚

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完全彻底的群众路线，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光大的。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新闻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它——这就是研究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作者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毛泽东同志的早期报刊活动及其新闻思想的萌芽	(1)
第一节 毛泽东同志开始报刊活动的历史条件.....	(1)
第二节 利用书报宣传唤起民众觉悟——毛泽东同志的早期报刊实践活动.....	(14)
第三节 毛泽东同志早期新闻思想分析.....	(33)
第二章 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在实践中的发展	(43)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	(43)
第二节 建党初期毛泽东同志报刊活动的新特点...	(50)
第三节 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发展的轨迹.....	(60)
第四节 把列宁的办报原则中国化.....	(68)
第五节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	(80)
第三章 毛泽东同志对无产阶级党报学说的理论贡献.....	(87)

第一节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	(87)
第二节	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唯物主义的反映 论原理应用于党报工作·····	(93)
第三节	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路线,在党报工作 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00)
第四章	毛泽东同志的新闻文风特色 ·····	(108)
第一节	毛泽东同志的新闻写作特色·····	(109)
第二节	毛泽东同志的报刊政论风格·····	(117)
第三节	毛泽东同志的报刊编辑工作·····	(131)
附录	毛泽东同志报刊活动简表(上) (一九一〇年——一九四九年)·····	(140)

第一章 毛泽东同志的早期报刊活动及其新闻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毛泽东同志开始报刊活动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存在而发生变化。考察毛泽东同志早期新闻思想形成的条件，自然不能抛开对他当时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和他自身独特经历的了解。

毛泽东同志的报刊活动开始于本世纪之初。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经腐朽，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戊戌政变的失败，用血的事实向中国人民证明，希望封建统治者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虽然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革命的果实反被封建军阀所窃取。反动势力的猖獗，广大人民群众的不觉悟，使资产阶级革命仍然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一些曾经高喊革命的人开始转向，与旧势力、封建军阀同流合污；也使得一些人感到束手无策，苦闷彷徨。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向专制制度投降，不

肯向封建势力妥协，他们仍然在孜孜以求，寻找着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他们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过去革命所以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他们终于认识到：“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号，1916年1月）

反映这个历史进程的资产阶级办报活动，曾经对早年的毛泽东同志发生重要影响。

毛泽东同志出生在湖南湘潭附近地方一个农民的家里。湘潭当时是湖广贸易的集散市场，湖南同广东、江西等省的进出贸易相当繁荣，往来商旅很多，新的风气传入很快，政治空气也活跃。毛泽东同志早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书刊报纸的影响。他曾经在深夜的油灯下，以极大的兴趣读完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郑观应所著之《盛世危言》（见《中国近代报刊史》72页），这本书所论甚广，认为中国富强之道，即在兴学校、讲西学、改考制、开矿业、修铁路、办日报等。在《日报篇》里，郑观应曾提出“广设报纸”，以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实行君民共主。这些，都给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另据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记载，早在一九一〇年，毛泽东同志还在东山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喜欢看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梁氏“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他读了又读，乃至默记在心（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1页）。

《新民丛报》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以后，资产阶级改良

派的一份重要报纸，曾经介绍过大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文化思想界作了广泛的反封建宣传。当然，《新民丛报》的一系列宣传，都是为鼓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但是，就其内容和宣传的方式来说，所达到的社会效果，却大大超越办报人的主观意图。譬如，它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抨击，对社会陈腐观念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介绍，特别是报纸使用的那种适合于政治斗争和思想发动的新文体——报章体（亦称“时务体”、“新民体”、“康梁体”），尤其受到时人的欢迎。这种文体，“纵笔所至，略不检束”，“一不求‘典’，二不务‘雅’，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且触及时弊，夹叙夹议，事实说话，笔锋常带感情”（《新闻学习》1981年6期），为青年毛泽东所乐于接受。毛泽东同志学生时代作文即“习梁启超式的文体”。刚进入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他作文仍然是用“康梁体”，以致他的老师袁老先生说他：“你的文章尽是报馆味。”（《百丈高台，始则一石》，见1978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由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的主张和实践给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可见一斑。

戊戌维新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鲸吞蚕食的情况下，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封建知识分子的一次救亡图存运动。它体现了发展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进步作用。而办报纸，则是他们宣传维新，推进改良运动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们非常看重报纸所发挥的宣传鼓动作用和组织发动作用。梁启超本人在领导维新活动之初，就曾指出：“度欲开学，非有报馆不可，

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3页）。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第十七号上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明确指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第1页）

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度重视报纸作用的办报思想以及他们倡导的那种“时务文体”，不仅在戊戌维新前后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之后的报纸都发生重要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对毛泽东同志也是很大的。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继承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思想，把报刊宣传始终同他们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极度重视报刊宣传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立党、组织起义时，始终强调利用报刊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动员工作。自兴中会建立到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先生就参与创办和指导过十几种革命报刊。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曾经明确指出：“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覩之。”（《民报》1号）他强调，要重视革命报刊宣传，“以鼓舞人心”，“增多热力”，“使人人知所适从”（转引自《新闻学论集》第4辑115页）。他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都来参与这一“唤醒中国人之工作，使其由久眠中醒来，进入现代之进步途程”（转引自《新闻学论集》第4辑116页）。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主张和报刊实践，不仅对促进当时革命的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对促进革命知识分子的迅速觉醒和中国革命报刊事业的发展，

都发生积极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春，毛泽东同志考取“驻省湘乡中学”，第一次来到长沙。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置身于这个环境，毛泽东很快就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气息。本来，自上世纪末，维新运动在湖南就曾风起云涌。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均系湖南人，梁启超也亲临该省，创学堂、办交通、开矿业、练民团、出版《湘学新报》、《湘报》，力倡新学，鼓吹维新。社会上曾形成“言新则群喜，语旧则众唾”的局面，湖南也被称作“最富有朝气的—个省”。如今，虽时过境迁，然而，当年维新遗风余韵犹存。尤其在长沙，革命党频繁活动，社会风气异常活跃，新知新识层出不穷。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读到由“同盟会”会员主办的《民立报》，并立刻被报上激烈锋利的反清言词和“激动人心的材料”所吸引。他从《民立报》上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7页），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他还在这份报纸上看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举行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死难的消息，“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对此，毛泽东本人作了这样生动的记述：“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3页）

从这些振动人心的报道中，毛泽东看到了革命报刊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认真地研究每一天的报纸，他认识到从报纸上可以学到许多很有用的知识。这正如同他后来自己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所说的：“我是一个热烈的读报者，在当时的报纸中，跟革命有关系的是《湘江日报》，这报纸上讨论

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学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毛泽东自传》，斯诺记录，上海光明书店出版）在当时，对于毛泽东这个充满求知欲望的青年学生来说，《湘江日报》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曾经连续给几个同学写信，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当然，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湘江日报》上所讨论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还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科学的理解。然而，从前人办报的实践中，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的办报经验中，从读报所获得的启迪和教育中，毛泽东开始对报刊这种舆论工具的重大政治作用有了认识。

在长沙读书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开始用政治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审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使他非常注意报纸上关于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当时他的思想如同列宁对沙皇专制压迫下俄国进步思想界所描述的一样：“贪馋地寻求正确的革命道理，极勤奋极仔细地注视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69 页）。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一篇题为《读书会的商榷》的文章中提出：“报是人人要看的東西，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表达了他对报刊的重视。当时长沙有一份叫作《公言》的报刊，比较详细地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毛泽东同志每期必读；还有一种叫作《甲寅》的杂志，刊登不少反对帝制的文章，他也常到别人那里借阅。在毛泽东同志后来读书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图书馆里，有许多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毛泽东每天都去看一、二个钟头。

据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先生回忆说：“第一师范的同学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白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周世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后来自己回忆当时热心读报的情况时也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斯诺《西行漫记》四章 126 页）从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从接触社会政治之初，就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促使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产阶级报刊宣传所给予他的直接影响。

当时，毛泽东同志还没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思想上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也只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虽心怀振兴中华的抱负而忧国忧民，但是却不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和解释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不过，由于他自觉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已经大大开阔了眼界。他从前人革命的经验 and 自己的经历之中，逐步体会到“唤起民众之觉悟”对于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报刊宣传对于“唤起民众之觉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民众“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他慨叹“现在国民思想狭隘”，“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他呼吁要“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张昆弟 1917 年 9 月 22 日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同志与蔡和森、张昆弟之谈话）。然而，他又把希望寄托于圣贤豪杰，